

统计资料显示,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不少运动员不但技艺惊人且收入不菲:其中收入最高的20位运动员2011年入账4.48亿美元,是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投资的10倍多。这与他们背后成熟的商业运作密不可分。

网球与篮球:最能“造富”的运动项目

伦敦奥运会共包括302个运动小项,不同运动项目之间商业价值差别巨大,网球和篮球无疑是“含金量”最高的运动项目。在福布斯发布的收入最高的20名奥运会运动员榜单中,除去“飞人”博尔特之外,12名是篮球运动员,7名是网球运动员。其中收入最高的是网球名将费德勒,2011年收入高达5430万美元。

而在2012年全球名人榜中,共有17名运动员上榜,其中网球、足球和篮球仍是“造富”能力最强的运动项目。他们在具备超高人气的同时,也收获了巨额财富,年收入动辄数以千万美元计。业内专家介绍,明星运动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即比赛奖金和商业代言收入。虽然不同运动员在两种收入比例上不尽相同,但是两者都不是小数目。以目前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李娜为例,2011年李娜比赛奖金共300多万美元,而其去年总收入约在2000万美金左右,80%以上收入都来自于商业代言或赞助。不同体育项目之间为何商业价值差别如此巨大?上海体育大学刘清早教授解释,首先,与体育项目的可观性有关,项目可观性越强,其商业价值

奥运明星如何变亿万富翁?

也就越大;其次,与体育项目的特性有关,以网球为例,网球的背后是“网球文化”,意味着健康、档次和公平,契合人们对于文化的崇尚,篮球则会给人以灵活与高大的感觉;此外,还与比赛环境有关,篮球、网球等运动项目都有固定的比赛场地,不仅有利于运动员发挥,也为优质的转播画面提供了条件,商业价值自然也就大。

体育明星缘何“价值连城”?

在明星运动员的代言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运动服饰、电子产品、手表和饮料等品牌,阿迪达斯和耐克就是不少明星运动员的“钱袋子”。2011年李娜除了代言耐克之外,还与哈根达斯、三星、奔驰、昆仑山矿泉水等品牌建立合作关系,其中不少合同都是百万美元以上。

奥美集团体育营销总监强炜指出,现在大众消费品与运动结合越来越明显,相关的广告沟通也越来越多,不少企业正是借助体育营销实现高速发展,比如红牛。

刘清早进一步解释称,体育运动的短期性、震撼性和高关注度都与大众消费品的推广方式相吻合,因此体育明星营销是这类企业的重要营销手段。

本次伦敦奥运会的11家TOP赞助商,可谓大众消费品顶级品牌的荟萃。除了GE和斯伦贝谢两企业外,其他8家都是著名的大众消费品品牌。其中可口可乐从1928年开始赞助奥运会至今,已成为奥运史上一个传奇。

对于不菲的代言价格,强炜表示,明星运动员的广告代言价格一般有一个基准报价,最终的合作价格往往是赞助商与运动员或其经纪人在此基础上协商的结果,当然会受同行业竞争的因素影响水涨船高。但价格并不是运动员



取舍赞助商的唯一因素,运动员对品牌的偏好度,赞助品牌与运动员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市场推广力度,都可能会影响最终合作结果。

中国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尚待挖掘

尽管网球和篮球是造富能力最强的运动门类,但是中国运动员能淘到金的并不多。目前,除了李娜、姚明等少数人以外,中国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无法和一些发达国家运动员相提并论。

上海前锐体育经纪公司总经理沙伊峰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体育赛事商业化程度不够。

网球和篮球之所以能贡献这么多明星运动员,与市场化运作模式不无关联。网球有ATP(职业网球联合会)和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而篮球有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和EL(欧洲篮球联赛),这些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盈利为重要目的。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电视转播权,极高的曝光率也吸

引了更多的商家赞助。因为有着充足的资金来源,所以这些赛事对于赢家的奖励也毫不吝啬。WTA和ATP的比赛冠军奖金往往都在百万美元以上,而NBA篮球明星的合同金额数以千万美元计的也不少见。

与如火如荼的国外联赛相比,中国体育联赛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沙伊峰告诉记者,从受众上讲,篮球是中国参与度最高的运动之一,很多小区都有篮球场;从内容上讲,中国篮球联赛达到了亚洲一流的水平,CBA的市场价值可以做得比现在大。

业内人士介绍,CBA球队的收入以门票和赞助为主,而作为国外联赛重要收入来源的电视转播权拍卖在中国还很难实现。此外,NBA一年常规赛是82场,而CBA只有32场,使得中国联赛的经济价值大为降低,这都极大地影响了篮球在中国的“造富”能力。

(摘自《新华网》叶健 陆文军/文)



男子帮人买辽宁副省长职务被骗500万 不肯说出买官者

北京的王先生先行垫付600万替两个朋友买官被骗,直到案发也不说朋友到底是谁?诈骗王先生的嫌犯邹焰焰在市二中院受审。王先生当天没有现身,据知情人分析,王先生打算一人扛了,把买官的朋友说出来没有意义,私下里怎么给钱也与本案无关。

的要求,于2010年1月6日先付了100万元。

两天后,邹焰焰给了他一个公文袋,说马上就要任命,但要走程序,先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填一些政审表,每张都有公安部的章。王先生说,他看后害怕邹焰焰骗他,就说只有任命后才能填。

此后,他一直打电话、发短信催邹焰焰尽快办理升迁的事,邹焰焰每次都说任命马上就下来了,让他等。直到2010年10月,邹焰焰的手机关机了,无法联系。2011年1月,厅长调到了某部委任职,且副教授也没有升迁。

王先生随后到广州邹焰焰的家中找他。“他跟我讲,他找的那个领导被双规了,但事情还能办,让我等”,王先生说,他当时让邹焰焰马上退钱,但对方说没钱,先给他打了一个欠条,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王先生于是报案。去年8月24日,邹焰焰被抓。

花500万想给朋友买副省长

50岁的王先生是本案受害人,检方出具了他的证言。王先生说,他的一个朋友官至辽宁省一厅长,想谋求副省级职位;另一个朋友是政法大学副教授,想进公检法系统。

证言显示,王先生与邹焰焰是在2007年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亲眼看见过邹焰焰替别人办成过一个林业批文。邹焰焰多次表示自己的朋友与高层领导是党校的同学,“邹焰焰说他可以先给‘厅长’安排一个副省级职务,但办事费要500万元”,王先生当时表示同意,但希望事办成再给钱。邹焰焰就说先给100万元,事办成再给400万元。

看到红头文件后给钱

2009年11月17日,王先生给邹焰焰汇款100万元。没几天,邹焰焰说“厅长”的任职文件已经办下来了,并拿出一份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国务院37号令,任命某某为辽宁省副省级干部,后面还盖有国务院公章”,王先生说,邹焰焰让他看后就收走了,说文件是从中组部私自拿出来的,还得送回去。接着,邹焰焰就向他要剩下的400万元。但他说,要见到正式任命了才给钱。

两天之后,邹焰焰又约王先生,说“厅长”的任命已经下来了,又给他看了一份红头文件,“上面写的是中组部119号令,任命某某为辽宁省副省长,主管辽宁省科技、教育、文化,最后盖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章”。王先生说,这份文件,邹焰焰同样只让他看了一眼就收了回去,同时让他赶快交剩下的400万元,他看后就照做了。

催一年没结果后报案

王先生说,在办理“厅长”职务变动期间,邹焰焰又和他提出可以把“副教授”安排到公安系统担任政委,办事费300万元。他听后也同意了,并按照邹焰焰

而白花了600万元的王先生说,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和“厅长”“副教授”讲过帮他们办理升迁的事,“我只是想事成后再跟他们说”。

(摘自《新京报》)

村民起诉讨回乌木续:愿捐政府望得到400万奖金

“乌木之争”已经进入到了调解阶段,吴高亮的家人也希望能够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此前,吴高亮从承包地里发现的7根乌木,被通济镇政府以“收归国有”名义拉走。吴高亮觉得,首先还是谈7根乌木的归属问题。如果通济镇政府愿意归还乌木,他出于“支持彭州发展”的考虑,愿意将乌木捐献给镇政府。但捐献的前提是镇政府能够给予他400万元的奖金。

彭州乌木之争追踪 亮底牌?

吴高亮称镇政府希望能够把他前期雇佣挖掘机、农作物损毁的钱报销了事;彭州市相关方面则表示,镇政府的意愿不便回应。

日前,一纸诉状将彭州市通济镇政府告上法庭的吴高亮和代理律师张敏,接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回复,乌木诉讼进入立案前调解阶段。调解将由成都中院主持,吴高亮将和通济镇相关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协商。

吴高亮要求到底归谁 先谈清楚

代理律师张敏解释,因为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成都中院会在立案前进行调解,调解期为20天。如果双方能够达

成一致,就会避免对簿公堂。这几天,成都中院会分别了解吴高亮和通济镇政府的意愿,并组织对双方的调解。

对于调解,吴高亮觉得,首先还是谈7根乌木的归属问题。如果通济镇政府愿意归还乌木,他出于“支持彭州发展”的考虑,愿意将乌木捐献给镇政府。但捐献的前提是镇政府能够给予他400万元的奖金。

镇政府意愿尚未向媒体公开

在7月26日提交成都中院的诉状上,吴高亮特别增加了一条,要求通济镇政府赔偿因其保管不当造成乌木损坏的费用10000元。对于这条诉讼,吴高亮解释,乌木被拉走后存放在通济镇客运中心。但是,他发现经常有些孩子爬上乌木玩耍,乌木的一些枝丫都被损坏了。因此,他提出这条要求,希望通济镇政府能够为自己不当的保管行为负责。

不过,吴高亮也表示,如果调解顺利,通济镇政府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可以不再追究镇政府的不当保管行为,10000元的索赔也可以不要。吴高亮称,最近通济镇政府联系他,还是希望能够把他前期雇佣挖掘机、农作物损毁



的钱报销了事,但被他拒绝。

对此,成都商报记者近日致电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郭坤龙,但一直未能联系上。彭州市相关方面负责人则表示,镇政府的意愿不便回应。

新闻背后

调解还是起诉 家人也起争执

“乌木之争”已经进入到了调解阶段,吴高亮的家人也希望能够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此前,吴高亮从承包地里发现的7根乌木,被通济镇政府以“收归国有”名义拉走。

的钱报销了事,但被他拒绝。对此,成都商报记者近日致电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郭坤龙,但一直未能联系上。彭州市相关方面负责人则表示,镇政府的意愿不便回应。

“乌木之争”已经进入到了调解阶段,吴高亮的家人也希望能够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此前,吴高亮从承包地里发现的7根乌木,被通济镇政府以“收归国有”名义拉走。

创业和制造业的关注,从而防止实体经济的衰退。”

不过,在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元京看来,目前我国企业负债率到底是否达到107%还需要考证,但是这个数据也显示,我国企业负债存在一定风险隐患。“之前民间中小企业贷款出现失控局面,企业负债率较高,在未来投资中需要对企业债务风险进行更好的防范。”

在企业高负债率的另一面,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资本炒作以及去年以来备受关注的民间借贷问题已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障碍。而无论是在年初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还是央行7月2日对外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都将主题落

在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上。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金融体系不能单纯追求利润和回报,而要真正对实体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谭雅玲表示,信贷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过度集中扭曲了行业 and 产业的均衡发展,对于信贷投资政策将产生不利影响,应当加强对中小企业以及新型产业等对症投资的投放力度。

王元京则认为,要解决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就要拓宽融资渠道。“目前企业负债过高问题,多是因为融资渠道过窄所导致,由此,未来可以完善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不断拓展股权融资并鼓励民间投资,来降低企业负债率,保证企业融资健康合理发展。”

王元京同时表示,按照他的判断,当前我国企业负债的风险并没有处在不可控制的边缘,一些大项目投资应该不会受到影响,未来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将会依然存在。

(摘自《北京商报》)

负债占GDP比重达107% 中国企业高负债率预警实体经济

中国企业高负债率为实体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而这也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为有待丰富的命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日前举行的中国银行家论坛暨2012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企业的负债占GDP比重已达107%。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未来可以完善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不断拓展股权融资并鼓励民间投资来降低企业负债率,保证企业融资健康合理发展。

“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很重要,中国金融界近期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目前企业的高负债率现象。”李扬表示,OECD(经合组织)企业的负债如果占GDP的90%就很危险,而中国2011年的统计是107%,是世界国家中最高

的,如果再推一个小版的“4万亿”,将会给未来埋下隐患。此前李扬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企业过多负债,如果经济在平稳稳增长轨道上运行就没有问题。但如果经济波动,甚至出现下滑,企业就会还不起债。银行就会有不良资产,这样就会影响到宏观经济。

针对当前企业高负债率所反映出的实体经济难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谭雅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企业的高负债率确实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前存在一些光有信贷投资投放和货币供应量而缺乏创造力的现象,一些实体经济甚至利用信贷货币政策作为套利投资的工具,我们呼吁社会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本身,加强对